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貼近與錯身：作為情感的亞細亞

Getting Close and Passing by: Asia as Affect

doi:10.6752/JCS.201109_(12).0007

文化研究, (12), 2011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2), 2011

作者/Author：王智明(Chih-Ming Wang)

頁數/Page：114-12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07](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貼近與錯身：作為情感的亞細亞 Getting Close and Passing by: Asia as Affect

王智明
Chih-Ming Wang

一、前言

閱讀《敬重與惜別——致日本》，迎面而來的是暈眩與感動：暈眩於那複雜交錯的歷史，並為自己的無知感到驚恐；感動於那些願意為理想奔走，乃至犧牲的志士，並為其理想與後來歷史的背馳感到意外而惶恐。原來想法是可以宏大高遠、激動人心，但它同時又會造成無比的傷害與苦楚。這也使得我們不得不對歷史保有敬重之心，不去太快地評判是非對錯，而是在脈絡中尋求理解與同感的可能。《敬重與惜別》也要求我們同時懷有惜別之情，不天真的以為歷史已是過去，錯誤無可彌補。其實，現下、過去與未來原是一連續互動的整體，無可切割，是一前仆後繼，又不停反饋翻攪的運動。我以為《敬重與惜別》不只是寫給日本與中國，也是寫給身在亞洲的每一個人，期勉我們回溯自身四方糾纏的主體生成，在敬慎歷史的心情中重新踏出腳步。

二、為什麼是亞洲？

「亞洲」是近年來討論頗多的一個課題。¹作為一個文化與地理概念，亞洲是一個說不清楚、講不明白的東西。雖然指認亞洲為何不

成問題，但是確切描述亞洲是什麼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論者大都同意「亞洲」這個概念乃是歐洲製造的，是歐洲現代文明自我指認的構成他者(constitutive other)。汪暉就指出：在歐洲的語境裡，

亞洲不僅是一個地理範疇，而且也是一種文明的形式，它代表著一種與歐洲民族—國家相對立的政治形式，一種與歐洲資本主義相對立的社會形態，一種從無歷史狀況向歷史狀態的過渡式。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亞洲話語內在於歐洲現代性的普遍主義敘述，並為殖民者和革命者制定他們的截然相反的歷史藍圖提供了相近的敘述框架，這個框架的三個中心主題和關鍵概念是帝國、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汪暉 2010：7）

這個說法並不陌生，也充分說明了亞洲話語的現代取向，並指向一個漸進的時間性如何統攝亞洲想像的可能：（過去）西方帝國主義的肉殍、（今日）亞洲民族國家的振興，以及（未來）經濟統合下的亞洲市場。這個時間性的想像將亞洲表述成爲一種頗爲奇怪的雙重性格：它既是過去的，也是未來的；它既是分裂的，也是集體的；它既對應著西方現代性的思維邏輯，但又有著一條內在的理路與想像。針對亞洲的雙重性格，汪暉建議梳理兩個相關的歷史問題來處理：一是重新清理社會革命視野中的「大亞洲主義」（這也是張承志的主要命題）；二是重新思考「朝貢體系」這個概念之於世界史的當代意義。對汪暉而言，朝貢體系乃是一套內在於亞洲文化與政經脈絡中的國際體系。它不僅對東亞近代的來臨提供了不同的解釋，突出了西方民族國家想像的局限，也挑戰了西方以條約關係結構世界的方式。朝貢體系的皇朝想像與解釋效度或許仍待商榷，但它畢竟嘗試了一條從亞洲內部關係出發的思路，並提供了一個重新敘述世界歷史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亞洲不僅僅是作爲西方的對立面而存在，而有了作爲一個歷史實體的可能。同樣地，在社會革命視野裡，亞洲也不盡然只是一個被西方帝國主義制約的空泛話語和概念。相反地，它曾是一道熱烈的行動綱領。汪暉強調：「大亞洲主義是一種通過民族自決來超越帝國主義的構想，也是一超越種族、文化、宗教和信仰的單一性的多元民族主義」（*ibid.*: 27）。他引述李大釗的說法，亞細亞主義「重視的不是國家間的聯合，而是『全體民衆』的聯合，從區域或世界的組織必須是一種以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爲前提的『民衆的大聯合』」（*ibid.*:

28)。²民衆聯合的想像正是亞細亞情感的起點，這也是日本志士（如宮崎滔天與北一輝）願意投身亞細亞主義的洪潮的心情，儘管這個想法也為後來的大東亞共榮圈打造了悲劇性的結局。換句話說，雖然社會革命話語裡的大亞洲主義是以尋求民族獨立為起點，但是以民衆為主體的聯合與連帶想像卻使之含有「在地行動、全球思考」的革命願景，因為大亞洲主義者相信：一時一地的革命、或是一族一國的解放皆是彼此相連、互相關涉的，並最終是以重建全球秩序為依歸的。³

在考慮解放亞洲的理想時，汪暉特別引述了日本學者野村浩一對宮崎滔天的討論。和許多日本的亞細亞主義者一樣，宮崎與孫文交好，協助並參與了辛亥革命。然而，一生參與中國革命的宮崎卻有著「雙重悔恨」：「一，後悔自己為什麼作為日本人而沒有作為中國人參加這場革命呢？二，在將全身心奉獻給『支那革命』以前，為什麼沒有致力『日本的改善』呢？」(ibid.: 34)這是一個沈重的問題，也是亞細亞主義最重要的命題：亦即，為什麼立意良善，以解放弱小民族為出發的亞細亞主義，最終會落入大東亞共榮圈的軍國想像與歷史悲劇？為什麼扶助鄰國的努力最終卻成為侵犯弱者的暴力？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出了問題？難道亞細亞主義，一如朝貢體系，只是一場皇國夢，是日本浪人的囈語？難道助弱扶傾的思維真的只是帝國的新衣？究竟大東亞共榮圈是亞細亞主義之必然，還是意外？當我們揮別了二戰的悲劇後，亞細亞的歷史是否仍有值得敬重之處？企圖打破冷戰思維的我們又是否該與亞細亞惜別？對於我們，今天討論「亞細亞」還有什麼意思嗎？

這些問題或許並不新穎，卻仍未被充分回答。《敬重與惜別》是一次深情的嘗試，藉著重新清理亞細亞主義的迷魅與實踐，再次追問亞洲的意義。張承志將亞細亞主義理解為兩股互相矛盾的情感：一邊

2 汪暉引述李大釗的出處有二：一、〈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國民》雜誌第一卷第二號(1919/02/01)；二、〈再論新亞細亞主義〉，《國民》雜誌第二卷第一號(1919/11/01)。

3 黃自進就指出，在大亞洲主義興起的時空，民族國家的概念在亞洲尚未被普遍接受，因此某種以區域為主體的思維模式與國際秩序仍是可以被想像的。見黃自進(2001: 113)。

是以西方為師，富國強兵的大國情結，為霸道之鷹犬；另一邊與西方為敵，濟弱扶傾的俠義精神，為王道之干城。⁴這兩股矛盾的情感時而對立、時而統一，結構與制約著我們對於亞細亞的想像。或許這樣的說法太落入二元對立的窠臼，因而如今看起來更像是一種懷舊的心情，是對亞細亞歷史的惋惜與哀嘆。但是它同時也是對今日糾纏不已的中日關係與全球狀況的一次針砭，是對人性與道德的呼喊。在東亞情勢持續緊張、美國軍事霸權依然鞏固的今天，或許亞細亞主義沾染著太多歷史的塵埃，不太具有實踐的可能。可是作為一種心情，「亞細亞」三個字似乎仍存在著某種感性與知性的魅力，迫使我們持續追問亞洲與自身的牽扯，重新認識亞細亞的歷史與教訓。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理解自身的亞洲身分和歷史，並想像一個「後亞細亞」的未來。

三、心情的亞細亞主義：敘述的難處與情感的糾纏

真誠的亞細亞主義者是確實存在過的。(242)⁵

不誤解，真相知，連說說都覺得太難。即便中國人能恢復古風知耻而勇，而且棄大國夢如糞土——與中國前定為鄰的日本人，他們能與自己代代出征的父兄師友，能與自己稱霸亞洲的青春夙願之地、鮮血淋漓之地決裂麼？(16)

在《敬重與惜別》的開篇裡，張承志講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名為服部幸雄的日本老人曾在蒙古東烏珠穆沁的新蘇木「送走了青春」，並在青春結束的許多年後回到中國扶助青海的貧童就學。服部在中國近乎無私的奉獻與他「原右翼青年」的政治養成形成了一種無法理解的矛盾。曾在川島浪速門下服務，以支持滿蒙獨立、瓦解中國為職志的服部怎麼會在中日戰爭結束多年之後，回轉中國從事慈善？他在蒙古送走的青春又是什麼樣的青春？繼承這段敵對歷史的張承志（及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這樣分歧的交會？究竟我們應當如何看待日

4 這也是孫文在〈大亞洲主義〉(1924)裡，對日本發出的警語。

5 編註：本文中僅標示頁碼者，出處均是《敬重與惜別》一書。

本的近代、滿蒙的獨立、中國的崛起、浪人與志士、感恩與謝罪、罪惡與義舉、左右對錯好壞等等相悖共存的亞細亞歷史？我們要如何敘述亞細亞，並面對敘述中複雜而糾纏的情感？

從橫須賀三笠公園裡的歷史回聲與長崎原爆的核彈傷痕說起，張承志帶我們進出中日歷史之間追索亞細亞的心情。橫須賀與長崎分別代表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起點與終點：前者是培里黑船打開鎖國日本、引發維新強國的入口，後者是帝國瓦解的核彈餘燼。日本的亞細亞心情就在面對西方威脅與戮力反抗西方的過程中開啓又闔上。這個過程中有著軍國征服世界的野心和狂妄，也有著真誠保衛亞細亞為己任的義氣與勇氣。從甲午戰爭經日俄戰爭到英日同盟，日本的躍升是無可否認的，它也鼓舞了一代的亞洲青年從事革命、尋求民族解放。然而，快速的成功與「八肱一字」的皇國思想驅使日本為了追求帝國的虛妄，而放棄了與他者存亡的正義原則。原欲抵禦外侮的炮艦轉向亞洲，因而造就了亞細亞的悲劇。張承志強調：「偉大的日本精神，令人憧憬的日本精神，不是被原子彈，不是被黑鐵或物質的凶器，而是被精神打敗了。在歷史的真理和永恆的道德面前，日本失敗了」(50)。然而，日本的失敗並不能就此消解亞細亞的歷史，就好像我們不能輕易地以「原右翼青年」的標籤來說明服部老人的身分。相反地，我們需要穿過軍國的虛妄與核爆的廢墟，在失敗的日本裡追尋隱匿其中的亞細亞——一個中日來往頻繁、彼此關連的商貿網絡，一個面向海洋開放的亞洲。在這個脈絡裡，張承志重讀了鄭成功的故事，並將之視為抵抗西方帝國侵略的前鋒。張承志認為，鄭成功收復／占據台灣是具有世界史意義的，因為它不但截斷了歐洲殖民主義的東海進路，起碼將西方帝國主義的威脅推遲了兩個世紀，它也在東海構築了一道亞洲的貿易網路：北起堪察加半島南至菲律賓，連結起朝鮮、九州、琉球、台灣與大陸。⁶或許這樣的 述難脫中國天朝想像的責難，但是一種亞洲內部跨境網絡的存在卻是不可否認的。只不過，歐洲殖

6 旅遊書《亞洲慢慢來》(2009)的作者就企圖以單車與行船來重新體驗這條環中國海的旅行路線，並視之為體驗亞洲的另類方法。

民主主義的到來截斷了東海內部的貿易與文化連繫；長崎的開港，一如後來的上海，轉而成爲歐洲思想、金融、謀略的堡壘，代表亞洲「入歐」時代的來臨。張承志仔細爬梳長崎複雜而矛盾的意義：長崎既是鄭成功東海貿易的前沿，也是日本輸入西方文明的口岸；它既是日本帝國崛起的舞台也是帝國毀滅的廢墟。西方武力爲長崎帶來毀滅，而長崎卻依然持續生產槍炮與軍艦。這些弔詭裡隱匿著亞細亞的真相：「一如長崎，它既是亞洲對西方的質疑，也是對自己的質疑」(104)。

正是在對西方他者與東方自我的雙重質疑中，張承志找到了迫近亞細亞主義的可能。藉著解說一個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故事——從〈赤軍的女兒〉到〈「亞細亞」的主義〉——張承志找到回應雙重質疑的批判性實踐。〈赤軍的女兒〉講述的是一群在1960年代安保鬥爭後投身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日本志士。這群名爲「阿拉伯赤軍」的志士們唾棄甘爲美帝走狗的日本而投身國際革命的狂潮；他們相信真理與公義的到來必須透過革命的實踐。⁷他們爲了世界上無助的人，那些被殺戮的人、被侵略、掠奪和凌辱的人，拋家棄國，拾起槍桿誓言保衛。張承志說：

阿拉伯赤軍——他們不過用犯規的嗓子喊出了真相，用極端的手段強調了公正。他們衣衫上滿濺的血污，使人忽視了他們捍衛和平的初衷。挺立在一浪浪推來、企圖把革命誣蔑爲一種惡魔瘋狂的，四十年不休不止的帝國主義宣傳之前，它提供了一個真誠的例子。它告訴了人們革命的合理，革命中人的犧牲，路的狹窄，情感的沈重，種種的不得已。(134)

阿拉伯赤軍爲了革命的正義付出了代價，也爲戰後保守的日本留下了一頁左翼傳奇。重要的是，它揭露了一種人的質地，一種願爲真

7 關於赤軍，池上善彥(2011)指出：成立於1969年的赤軍「他們的宗旨是武裝鬥爭和世界同時革命……他們認爲，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官僚主義太嚴重，已經失去了革命性。所以他們要打入這些國家內部，恢復他們的革命性，建立真正的革命根據地，推行世界革命……這個理論甚或殘留著始於戰前的所謂借助外力完成革命的亞洲主義的影響」。不過，一般對赤軍的認識比較是將它視爲恐怖主義的一支，是對和平的危害，如William Farrell的描述。雖然Farrell也理解赤軍的誕生有著反安保、反美帝的具體脈絡，但是他對赤軍的討論更聚焦在其暴力傾向（如淺間山莊的事件）與恐怖行動。(Farrell 1990)

airiti

理與正義犧牲而不悔的精神。在這純潔的精神裡，家國主權不是宣誓效忠的唯一對象，而是流血戰爭的緣由，是必須被超克的殖民遺緒。對張承志而言，赤軍的女兒——日本女性與阿拉伯戰士的結晶——是一個神祕的憧憬，因為她具現了人性的展現不以國族身分為局限。她不僅表露了正義與真理無國界的道理，更說明了正義與真理的追求亦是人性的淘洗，目的在粹煉和平的信仰，改正歷史的錯誤。同樣地，在〈四十七士〉與〈「亞細亞」的主義〉裡，張承志念茲在茲的是一種「義」、「殉」，甚或是「叛」的精神，是一種為所當為、奮不顧身的情感。不論是在青海扶貧的服部老人，還是收容印度革命分子布斯的頭山滿與中村屋主人，或是投身中國革命的宮崎滔天與致力研究伊斯蘭文明的大川周明，亞細亞主義顯露為一種真誠的心情，一種不以自身為限、助人助己的連帶想像。誠然，亞細亞主義日後走入偏鋒，成為建構與合理化日本大東亞帝國的理論思想。然而，百年之後，它依然如一縷幽魂，未曾輕易消散。誠如張承志所言，「連橫抗秦，營造新的亞細亞主義，讓日本和中國這對怨敵成為同盟——這一思路，常使人浮想聯翩，並感情衝動」(265)。

當然，張的說法充斥著浪漫化亞細亞的傾向，頭山滿、宮崎滔天、大川周明等人的功過也不是僅憑亞細亞主義就可以蓋棺論定的。但是，張承志的敘述的確叫人浮想翩翩，勾引我們重新思索亞細亞的真誠與心情，因為它不只是一篇合縱連橫的抵抗敘事，更是一次刀刀見骨的內省嘗試。他要求我們不要太快墮入受害者的情節，也不要自以為是地輕易拋棄亞細亞的心情。相反地，真誠地面對亞細亞的歷史，其實才是走出亞細亞陰影的不二法門。誠如張承志送給崛起中國的警語：

我們要開始清除——諸如四海臣、四方來朝、藩屬四夷，等等概念。否則何止日本，亞洲近鄰和第三世界對中國的不信，也會一天天積累。我們已開始意識——在物質和國家的富足之前，更要緊的是追求思想的富足。我們追求的，不是一個新的中華帝國。不，不只是富國，更不是強兵。我們渴望達到的，是一種尊嚴、寬容、善意、追求一切民族友好共存的，能稱之美的民族存在。(278)

尊嚴、寬容、善意與共存原是亞細亞的主張。如今它依然如此要求與期待著我們。

四、敬重與惜別

惜別——總是意味著強要的忘卻。它留下了背影，長懷著創痛。(229)

在《敬重與惜別》裡，與心情的亞細亞主義並列的是一種文學的貼近，是一次跨越思想與文字的親近。亞細亞主義不能沒有這樣的貼近，因為它不（只）是種族主義式的召喚，而是一種血性的溫潤，是在思想與文字邊緣的情感沾染。我以為，〈文學的「惜別」〉其實才是張承志這番重演亞細亞的核心篇章，因為它展演了一次次感性的靠近與分離。透過佐藤春夫、太宰治、堀田善衛與魯迅等人的交往與錯身，張承志試圖勾勒如何在文學的行旅中體察彼此的差異與深意的可能。一如魯迅筆下的藤野先生乃是留日學生周樹人一次深情的回望，在告別中堅守著呵護的溫情，太宰治《惜別》裡的周樹人則催生了敘事者「我」，在惜別之際摒棄了日本人的優越與傲慢，而向平等交往、不卑不亢的境界靠近。張承志寫道：

在整部《惜別》中太宰治竭力地、饒舌地、用一瀉千里的獨角自語，「端正描寫年輕的周樹人君」。但有趣的是：最終被他畫出的周樹人走了形，而一個戰爭後期的日本青年「我」，卻漏網一般，被塑造了出來。正是這個不意流露的角度，正是對這樣的一個「我」，應該不惜讚美。唯有他的出現才令人感奮，其中的深意，應予以再多一些的發掘。(207)

張承志對太宰治多所讚美不是因為他把魯迅寫進了日本文學，而是因為在戰爭後期中日對抗幾近瘋狂的時代裡，他流露了一個自省的、有思想的主體，為戰爭時期的日本文學提供了一個清醒的塑像，也為中日交往立下了一個平等互敬的典範。同樣地，張承志對堀田善衛的讚美也透露了一種感性的貼近，只是因為堀田清楚認識到中日交往的艱難。如堀田所言：

日本與中國的、在歷史或未來，它的相交相關的方式，遠不單是若國際問題那麼冷淡的、外在的東西。與其說它是國內問題，莫或說它是我們一人一人的、內心和內在的問題。是我們文化自體的歷史，不，甚至它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歷史自身。這樣，內在的問題其物，也就在它被稱為問題的百色萬端裡，在最終，成了有最富攻擊性格的東西。(222)

這是個複雜曲折的句子，用今天我們較為熟悉的理論語言來說，中國之於日本乃是一種內在性的問題，這個問題關乎的不是外在交往或聯繫的方式，而是日本自身的主體性生成如何包納與置放中國這個內在的他者。對於這種「內在他者性」的理解與對待，在張承志看來，正是中日關係最最關鍵與真實之處。對於堀田，他理解中帶著批判，並痛苦而真摯地寫著：

這是一句絕對的真話。但是它的過分，隱喻著施予對方的強迫。說到底仍是危險的歧視——似乎既然被它〔日本〕深愛，那麼作為對象的中國，先被奪去了拒絕的權利！中國能夠接受它麼？否。

堀田深知這一點並為此而痛苦。但這痛苦的底色，也印著文人的放縱——由母國強盛而被賦予的狎玩、占有的權利，和主人的感覺。我企圖與之論辯的原因，唯因他是一個真摯的人。因著這種真摯，最富攻擊性格的東西是可能棄留取捨，提煉珍藏的。(223)

對張承志而言，亞細亞的困難與糾纏正在此處，因為它是自身與內在他者性的交逢。對於日本，亞細亞的心情透露著日本國家強大的民族虛妄，以連帶的義理包裹占有的欲望；對於中國，它是一個被輕率排拒的連帶想像，在思慕與敬遠他者之際，緊抱著保守與虛妄的天朝自尊。透過亞細亞的感性想像，堀田善衛、佐藤春夫和太宰治等人成為內在於大東亞軍國思潮中的理性之聲。藉著書寫中國、指陳軍國日本的攻擊性格，他們凸顯了中日交往歷史裡的情感真實，在文化認同中隱隱區分著他我，或是說在他我的區分中傳遞著跨越民族的共感與共鳴。即令如此，張承志依然強調，日本文人對於中國文化資源的興趣依然耽溺於一種「擁有者和享受者的自信」；他認為，唯有「學會自律的規矩，他者的敬重，才能尋覓一種文學的貼近」(227)。正是這樣的敬重，使得惜別不只有了悲劇的美感，更有了正義的向度。亞細亞不該是占有欲望的表述，而是正義與真理的伸張，是願為他者奮鬥乃至犧牲的感動。正是因為這個正義的向度使得亞細亞成為一曲揮之不去的旋律，在四海波濤裡依然餘音裊裊——它留下了背影，卻叫我們心中長懷著創痛。

「惜別」不只是情感的，更是政治的表達。爬梳中日之間的亞

細亞情結正是張承志惜別的姿態。他一方面要透過日本的失敗提醒中國反省自身妄自尊大的強國夢，另一方面要中國珍惜「亞細亞」一詞所代表的第三世界連帶的思想與情感資源，不獨為日本所有，而可為世界的弱勢群體所共享。惜別因而不只是告別的不捨與遺憾，亦是對差異的尊重與珍惜，而這正是亞細亞主義最珍貴的核心價值，也是它叫人惜別不已的原因。張承志讓我們看到，思想亞細亞其實不是一種種族認同或是民族主義本位的呼求，而是對正義與和平的尊重。他在書裡不斷提及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的理想，呼籲世界各國必須放棄戰爭的手段，因為這是普世和平的呼求，是亞細亞主義最鮮血淋漓的教訓。同樣地，他對日本東洋學批判中亦帶著讚賞，因為它突出了一種跨越民族本位，對於知識的真誠。張承志說，或許日本東洋學「拖著一條不乾淨的尾巴，但它的呼喚裡也包含著對薩氏所言東方學的揭露與反抗——這種聲音，就是亞細亞主義」（264）。誠然，作為東方主義的同路人與對手，日本的東洋學留下了一筆豐富的知識遺產，它提供了重新理解亞洲的資源。這亦是亞細亞主義式的「惜別」。因此，亞細亞主義召喚的不僅僅是一種不同於民族本位的政治姿態與義理原則，亦是一套既內且外，要求自身與內在他者性碰撞的知識想像與文化資源。在軍事情勢與領土爭議依舊緊張的今天，亞細亞的奧義仍待挖掘，其歷史尚須超克。如張承志所言，「我們生活其中的，仍是惜別的時代」（276）。

五、結語

在這篇不像論文不像感言，可能過度詮釋的讀後感裡，最終試圖清理的其實還是一種揮之不去，名之為亞細亞的情感。顯然，這情感沾染太多灰塵與血痕，而顯得黯淡陰沈，然而它卻像是強要忘卻之物，總在不意間襲來。對我來說，這種被突襲的感覺其實來自於與亞洲朋友交往的經驗。90年代末的一趟日本之行為我打開了一扇亞洲之窗，讓我有面對亞洲的實感。一方面當時年輕、操著英語、聽著美國流行音樂的我們，沈醉在一種跨國體驗裡，另一方面我們也隱約感

到英語的不足，以及亞洲歷史的複雜：當時與大陸朋友交往總是多所保留，只因為共匪的形象、統戰的陰影揮之不去；對日本朋友的喜愛則帶著一絲背叛家國歷史的隱憂；對澳洲紐西蘭等地也算亞洲感到莫名其妙；對新加坡朋友流利的中文與「台語」則感到意外而好奇；對於越南、印尼與馬來西來朋友則一無所知，幾乎無從交流起；韓國朋友的名字與讀音怎麼也對不上號，與香港和新加坡朋友交往則怎麼也沒想過他們也有中文名字。即令如此，那是我生命中一次極為重要的國際體驗，遠遠超出後來出國求學的衝擊。這段幾近無知的經驗包裹著亞細亞的複雜與深刻：原來我們是如此緊密又陌生。或許正是因為當時缺乏了對亞洲歷史的理解，所以我們可以輕易分享彼此的日本經驗與美國想像，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錯失了一次更深刻認識彼此的機會。我們相遇了，卻與亞細亞錯身而過。然而，當接待家庭的老媽媽誠懇望著我和馬來西亞來的朋友，坦承日本犯下錯誤而她深感歉意的時候，我深受震撼而無言了。這不僅僅是因為身受招待的我不知如何應對這樣的歉意，更是因為那歷史使得當下的交往顯得沈重無比。我無法調解當下的日本與歷史的日本之間的距離，更無力去顧念馬來西來與台灣經驗的差異。所謂的亞細亞，只能是一次情感的體會，一次驚嚇的貼近。

汪宏倫在討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怨恨心態的文章中指出，對於「民族主義『不值一駁』的輕蔑態度，恰恰是當前民族主義研究的一大盲點」（汪宏倫 2010：154）。他強調面對日本右翼的怨恨心態，我們不能逃避與排斥，而要試圖理解。他說，「如果『溝通』與『和解』還有可能的話，那麼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工作，是暫時放下自己的感情，嘗試理解對方的感情與感受。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懷抱著不共戴天的國仇家恨來看事情，那麼即使溝通也成為不可能，和解也就更加遙遙難期了」（ibid.: 197）。賀照田也指出，「能不能意識、體會、進入、理解乃至共有對方的深層困惑與苦惱，是決定亞洲討論能否建設性深入的關鍵之一」（賀照田 2005：243）。這是肺腑之言，也是重省亞細亞的深意所在。歷史造成的苦難與痛楚我們無法一體承擔，但是我們不能不回應。必須回應的，不只是（民族）立場的選擇，而是更深的自省與理解的嘗試。它必須是對他者的敬重與本體的自律。或

許亞細亞其實是一個個無法訴說、卻又不得不說的故事，它只能在一次次的遭逢中被體會，或是在告別中繼續回味。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王柯編。2007。《東亞共同體與共同文化認知：中日韓三國學者對話》。北京：人民出版社。
- 白永瑞。2009。《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池上善彥著，顏麗蕊譯。2011。〈戰後日本左派中的亞洲聯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八十一期，頁353-363。
- 汪宏倫。2010。〈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十九期，頁147-202。
- 汪暉。2010。《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敘述》。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林存青、江心靜。2009。《亞洲慢慢來：日本沖繩和九州》。台北：聯經。
- 孫歌。2001。《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
- 賀照田。2005。〈中國革命與亞洲討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五十八期，頁243-56。
- 張承志。2009。《敬重與惜別——致日本》。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 陳光興。2006。《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
- 黃自進。2001。《北一輝的革命情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二、英文書目

- Farrell, William R. 1990. *Blood and Rage: The Story of the Japanese Red Army*. Lexington, MA: Lexington.